

中国历代教育家传

周谷城题



中国历代教育家传

主 编 林耀华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吴 芳 黄宝权
彭 建 谢慈迁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B 602478

中国历代教育家传

主编 林耀华

责任编辑: 黄晓屏 张其增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应元路大华街兴平里3号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47 字数: 130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110-00662-X/G-152

定价: 35.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由全国十几所大学、研究所的专家教授参加编写。为历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充、郑玄、荀悦、颜之推、韩愈、胡瑗、张载、王安石、程颢、朱熹、李贽、顾炎武、李颢、颜元、容闳、张之洞、刘古愚、严复、康有为、蔡元培、章炳麟、梁启超、陈嘉庚、张伯苓、王国维、徐特立、黄炎培、吴玉章、陈垣、鲁迅、马君武、李大钊、李四光、陶行知、林砺儒、李达、陈鹤琴、叶圣陶、杨贤江、恽代英、刘继曾、成仿吾、刘泽如、闻一多、王力、梁思成、吴文藻、李融中、华罗庚、陈唯实等树碑立传。它歌颂了中国教育家对祖国文化教育的伟大贡献和他们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记述了教育家的成长和经历、办学执教的经验。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树立了立志做人的榜样。

本书是目前第一部内容含量最大、质量较高的教育家传。全书以传记式描写、富有故事情节、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可读性较强。适合广大师生和群众阅读。

主 编 介 绍

林耀华1910年生于福建古田。1928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师于吴文藻教授。193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深造，1940年获哲学博士。1941年回国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解放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等职务。影响较大的论著有《凉山彝家》、《民族学研究》、主编教育部的《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原始社会史》等。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卓著获国际学术界好评。《世界名人传》[美]，《成功的人》[美]，《国际荣誉名册》[美]，《文化人类学事典》[日]等十多种国际名人传记收录介绍了林耀华教授。

B735/29
目 录

孔 子	(1)
墨 子	(29)
孟 子	(44)
荀 子	(61)
董仲舒	(71)
王 充	(79)
郑 玄	(91)
荀 悦	(103)
颜之推	(110)
韩 愈	(121)
胡 瑗	(136)
张 载	(146)
王安石	(156)
程 颢	(180)
朱 熹	(198)
李 贽	(205)
顾炎武	(216)
李 颢	(224)
颜 元	(235)
容 闳	(243)
张之洞	(260)
刘古愚	(276)
严 复	(283)
康有为	(295)
蔡元培	(314)
章炳麟	(342)
梁启超	(364)
陈嘉庚	(375)
张伯苓	(390)
王国维	(400)
徐特立	(409)
黄炎培	(427)
吴玉章	(436)
陈 垣	(454)
鲁 迅	(468)
马君武	(487)

李大钊	(504)
李四光	(513)
陶行知	(520)
林砺儒	(539)
李 达	(549)
陈鹤琴	(573)
叶圣陶	(585)
杨贤江	(599)
恽代英	(607)
刘继曾	(625)
成仿吾	(635)
刘泽如	(644)
闻一多	(660)
王 力	(677)
梁思成	(693)
吴文藻	(706)
李融中	(712)
华罗庚	(719)
陈唯实	(731)

孔子

(公元前551~前479)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丰富、深刻，寓有深邃的哲理，其基本范畴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教育等方面。在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久，程度最深。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中国在上世界上被称为“文明古国”与“礼义之邦”，多与孔子思想分不开。中华民族讲道理的文明传统，宽厚宏阔的伟大气派与扶颠持危、见义勇为、杀身成仁的崇高道德风范，可以说多渊源于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生平事迹及教育活动

(一)立志愿，孔子从师学礼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其远祖是宋国贵族。到了孔子本人，已降为平民。

孔子的生年，约是公元前551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乙丑，孔子卒”，时年72岁。

孔子的籍贯与出生地，均是“鲁国 邑，昌平乡，阙里”。即今山东省、曲阜县城内东南尼山。

由于家境贫寒，孔子少年时期就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了。据说，他曾做过吹鼓手。这从他幼年“好礼”、玩礼仪的记载，以及他后来要弟子子夏“为君子儒”，不要为“小人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古时的“儒”，是专为贵族办理冠(男子成年时的礼)、婚、丧、祭等礼仪的一种职业。举行这些礼仪均须使用鼓乐，而职司鼓乐的人当中，有少年作副手。孔子后来自述他少年时“多能鄙事”，可能在没有礼仪办的时候还为人家做一些杂役，以维持生活。这也说明，少年时期谋生的多种劳役和艰难的经历，在孔子思想里是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因此他也学到了不少劳动本领，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多方面接触了贵族阶级和劳动群众，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与贵族们不劳而食而安逸生活的鲜明对照。

孔子最初学习的是礼仪。目的既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做官食禄。聪明的孔子，自幼与寡居的母亲相依为命，当然会有自养与赠养母亲和追求富裕生活的打算。种地吧？饥不得饱，而自己幼年却喜欢礼仪，进入少年时就已做开吹鼓手了，也多次看到了礼仪的场面，在年龄日增，生活需要与兴趣结合，特别是企图做官食禄的思想支配下，于是选择了学“儒”的职业，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他从学“儒”，亦即学礼仪起，便开始了自己的青年生活。

春秋时期的礼仪是从西周沿习下来的，内容很繁杂，因此学“儒”，学礼仪亦颇不容易。所以孔子15岁开始学习时，是靠父亲的老关系，由母亲托人带领他，到鲁国的太师那里去询问礼仪的底细。鲁国是周初大政治家周公旦的封疆，周朝的冠、婚、丧、祭等一切礼仪，是周公旦早在辅佐成王时制订的。及至春秋以来，周天子大权旁落，即所谓“周室(衰)微”而“礼乐废”的时候，“周礼(还)尽在鲁(国实行)”(《左传》昭公二年)。这时掌管“周礼”的便是鲁太师。所以孔子才到鲁太师那里去学，学习各种礼仪的设备种类、使用方法与各种典礼的进行程序。这是孔子学礼的一个方面。孔子另一方面的学礼，是实地参观，向有关人员请教。他“入太庙，每事问”，就是向有关人员请教各种礼器的名称、用途和使用方法的。当时有人讥笑他说：“孰谓鄹(同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他听到时说：“是礼也”(同上)。我正是要学礼啊。孔子就是这样从两方面专心致志，深入细致地对礼“学而时习之”的。此后孔子好礼的名声就在鲁国国都传开了。他17岁那年，鲁国的大夫孟釐子病故前，嘱咐他的儿子孟

懿子说，孔丘是圣人商汤的后裔，他祖先有讲“礼让”把君位让给兄弟的，也有辅佐了三个君主、本着“克己复礼”的精神撰写了“三命”铭文铸在宗庙传国的鼎上的；我听前人说过，圣人的后代，虽不当权也必通达事理；现在孔丘年少、好礼，我死以后，你一定要去孔丘那里，就教于他啊。孟懿子死后，孟懿子便遵照父亲的遗嘱，和鲁国贵族南宫敬叔一起到孔子那里去学礼了。

(二)办私塾，孔子创儒家学派

孔子18岁那年“秋七月”，给鲁国贵族看管仓库(即孟子所说的“委吏”)。以后，做到了“会计当”，出入库东西无差错。后又做了主管牛羊的所谓“乘田”，把牛羊饲养得很膘壮，他19岁“聘(娶)于宋元(音齐)官氏(的女子)”，(婚后)“一岁而生(儿子)伯鱼”。此时，鲁昭公已听到孔子好礼、知礼，对孔子有了好感，即送礼物——鲤鱼给孔子以表祝贺。孔子为了纪念昭公对他的这个祝贺，便为儿子取名鲤，立字为伯鱼。从此家庭生活负担加重，他即“贫而仕”，做了季平子家的“司职吏”(管理畜牧人员的小官)。这是个闲差事，他借机奋发学习，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到20岁那年，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守丧期间，因有些青少年去向他学礼，他便辞去“司职吏”的官职，在家创办了私塾，“始教学于阙里”，边教边学，以一个小型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始了儒家学派初期的学习与研究活动，并发表开评议时事政治的言论了。

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年26岁。由于几年来办学，与弟子们研究历史文化，评议时事政治，切中时弊，即被鲁国朝野视为闻人、名士、学者。之后，“受到鲁国”“季氏的赏识”，进入士大夫的行列。但后来，鲁国当政者听季孙之谗言诬陷，又驱逐孔子。孔子遂带领他的一些弟子离开鲁国到齐国。孔子走后，鲁国官员“公父文伯病故，其母不肯哭，”有人问她：“子死何以不哭？”她说：“孔子，贤人也，(被)逐于鲁，而是人(指公父文伯)不随也”。可知孔子在鲁国初次进入士大夫行列后的作为是颇得人心的。

孔子初次到齐国时，齐国的陈恒为争夺权力正与齐景公抗衡，后齐景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当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孔安国语)，齐国正处于政治混乱状态。不过，孔子这次到齐国，主要是为了考察政治，研习礼乐的。经过考察，他看到齐国政治较之鲁国还乱。他所说的“齐一变至于(才能赶上)鲁；鲁一变至于道”，可能即在此时。但他这次在齐，“与齐太师语乐”(研究音乐)，听取了舜时的韶乐，学习了三个月，学得很感兴致，竟醉心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因而赞叹：“不图(未想到)为乐之至于斯也”。意即音乐竟有这么大的感人作用，真使我心情舒畅极了。之后便离开齐国重返鲁国，专门致力于办学、研理。

孔子回到鲁国后，可能由于过去被逐于鲁，舆论对当政者此举有所非议，当政者亦有所懊悔，此时又恢复了善待他的态度。所以孔子在教学或与弟子们研究政治社会问题时，有时也发表一些评议时事政治的言论。

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他身長九尺六寸，人们因此呼他为“长人”。是时正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拨乱反正的英锐之气溢于言表，可能也表露有去周室实地考察的意向，弟子南宫敬叔觉察到了，便请求鲁君让他“与孔子适(去)周(考察周礼)”。鲁君同意，给了他们“一乘车，两马，一竖子(随从)”。南宫敬叔便同孔子相偕到周室考察去了。

彻底考察周礼，是孔子为时已久的愿望。他这次适周，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他“问礼于老子”时，老子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老子的一连串答复虽与孔子的愿望恰恰相反，然而老子自己却还是遵行周礼的。因之后来孔子曾从老子“助葬(帮助贵族办葬礼)于党巷”，实地观看了周礼中葬礼的进行过程。

孔子在周考察时，曾到后稷庙参观，庙殿右台阶前有竖立着的铁铸人象，即后世所谓“金人”，嘴上贴着三个封条，背上铸有“铭文”：“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言吧)！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要)安乐必戒(多言多事)，无行所悔。勿谓(多言多事)何伤？(多言多事)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正是残伤自己)；勿谓不闻(名于人)，神将伺人(时机到时，自会闻名于人)。滔滔不绝(的江河)，炎炎(干旱)若何(其多)？涓涓(细流)不壅(不控制)，终

为江河，……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强梁者(逞强霸道的人)不得其(好)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暴虐的统治者)。君子……温、恭、慎、德，使人(敬)慕之；执雌守下(安守平民之分)，人莫逾之(任何人不能超逾他的快乐)。内藏我智，不示人(以)技(能)，我虽尊贵，人弗我害。……天道无亲，常与(同情)善人。戒之哉！”孔子看完后，对其弟子说：“小子识之(记住)，此言实而中，情而信。”意即这些话符合实际，中肯，合情合理。但孔子却不完全信守这些话的精神，从此后孔子的言行，即可看出。

孔子这次在周室考察，开阔了眼界，也与老子交上了朋友。离开周室，拜辞老子时，老子对他说：“吾闻(古人说)‘富贵者送人以财(物)；仁人者送人以(善)言’。吾不能(以)富贵(送人)，(愿)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的人)，好议(论)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不要)以有己(应先考虑父母的需要)，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应先考虑国君的需要)”。孔子与老子相处了一个时期，虽感到彼此的社会政治思想截然不同，但认为老子所说的话，来自实践经验，使自己了解了知识界思想的一个侧面，特别是感到老子明哲保身知识渊博，出乎自己意料。

音乐对人的感染力，孔子在齐国时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肯定了“乐”与“礼”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他曾说“立于礼”(礼可使人在社会上立定脚跟)，“成于乐”(音乐能起到成就礼的作用)。

孔子访问周室，进一步加深了对“礼”“乐”的造诣，看到了夏、商、周时期的许多文物，眼界、思路均大为开阔，他赞叹“周监(同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即西周借鉴和继承了夏商二代的文化，所以文化更加繁荣，我们应该继承西周的文化。

赴周考察研究后，孔子的历史、文化、政治、伦理道德等学识大为丰富，声望也大为提高。就学于他的弟子也随之增多。史记说他“自周返鲁，弟子稍益进焉”。他接收弟子的条件是：“自行束修(只要拿一束肉干)以上，吾未尝(没有)无诲(不收教的)”，他的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贵贱人家的子弟一概收教。他的弟子绝大部分来自贫贱家庭，他的生活仍然是清苦的。但是他眼前有一大群风华正茂、努力学习，胸怀大志，决心为革新政治而奋斗的青少年弟子，这使他对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充满了信心，因而感到特别高兴。所以他并不以“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样的生活为苦，反而感到“乐在其中”，把当时贵族阶级残酷剥削人民而过的“富贵”生活视“如浮云”一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实际上在他的弟子群中，也有极少数富足或比较富足人家的子弟，这些弟子的生活用具一般多于老师。有一天，“孔子将行”(将要出门)，正值“雨，而无盖(伞)”。门人说：“商也有之”。孔子说：“商之为人也，甚饕(吝嗇)于财(物)，吾闻(君子)与人交(相处)，推其所长，违(避)其所短，故能久也”。孔子作为老师而能精细地体察弟子的性格，不强弟子所难的思想作风，是被传为佳话的。晋时有所谓“仲尼不假(借)盖于子夏(即商)，护其短也”之说。所说的“护其短”，是称道孔子不在群众中暴露弟子的短处而挫伤弟子的自尊心，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包庇弟子的缺点、错误。实际上，孔子对子夏慳吝财物、薄于友情的问题还是不放任的。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就是对子夏这样对待财物和友情不合于“仁”的原则的含蓄的批评，以启发其自觉克服这个缺点。这也是孔子所以被颜渊看作对弟子们“循循善诱”的一个因素。

到孔子时期，完整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已出现了严重分裂，亦即所谓“周室微而礼乐废”，周天子的法统已逐渐破坏。各诸侯多不服从周天子的权力，各国卿大夫、家臣也多不服从诸侯(国君)、卿大夫的权力了。

孔子自齐国再次返回鲁国，是把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希望转向鲁国的统治阶级的。然而此时鲁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原来“自大夫出”的政权，又下移到大夫家的“陪臣执国命”，即执政的地步。孔子对此更为反感，认为“天下无道”的危机较政“自大夫出”时加深了。然而，他不了解，这正是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再分配的必然性。所以他虽然审时度势，断言陪臣执政的局面长久不了，即所谓“三世希(很少能够)不失”势。但他却未乘机参与政治。这时执政的季氏的家臣阳货，打算任用他，生怕

去见他时他不肯接见(“欲见他”“而恶无礼”),使自己丢面子,于是便乘他外出时,着人“馈(送给)孔子蒸豚”,想让孔子回家后“往拜(谢)于其门”,借此与孔子商谈。孔子因对“陪臣执国命”有反感,也探听到阳货不在家时“而往拜(谢)”阳货不愿意与阳货见面。可是他离开阳货家时与阳货在路上相遇了。阳货说:“来,予与尔言:‘怀其宝’(怀有治国安民的政治才干),‘而迷其邦’(却看不清鲁国的发展形势,不参与政事),‘可谓仁乎’(可以算得仁人吗)?”继而又问孔子:“好从(政)事而亟失时(愿作官又不及及时来见我),可谓知(智)乎?”孔子还没来得及作声,阳货又告诫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光一去就不返了,时间是不等人的)。”孔子听了阳货这番谈话和告诫,觉得有其道理,于是应声说:“诺(好)!吾将仕矣。(我打算做官从政了)”但此后孔子或因鄙视阳货的为人,或因条件不合,仍未及时参与阳货的政事。后来弟子子贡打比方问他:“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是放在柜里藏着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个好价钱好呢?)”孔子理解子贡此话的寓意是启发、敦促他自己及早参政,于是答道:“沽之哉(卖它吧)!沽之哉!吾待价者也”。实则孔子此时是一面深入研究他所理想的传说中的尧舜之世(即原始民主社会),感到应从西周时期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中,先找出改革当时政治、社会的办法,重新安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这即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方面,在教育弟子们学习历史文化、政治中,也同弟子们互相讨论,即所谓“如切如磋(音错),如琢如磨”。孔子从古代文献中发现了“仁”及“仁”的解释,说:“古也有之,克己复礼,为仁”。他认为“仁”的第一要义应当是“爱人”,奴隶主统治阶级应当“节用而爱人”。其理由是:“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没有比人更为大可贵的东西)。孔子说,“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大意是说,《尚书》上说过,孝啊,唯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用这种态度去影响‘为政者’,这也算是‘为政’啊!为什么非要做官才算为政呢?这话初听了象是诡辩;但略加玩索,颇有道理。作为学者、高等知识分子、教育家、教育工作者,其言行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都是具有影响的。当然孔子此语也含有启发弟子们安心学习、学行结合的因素。

孔子返鲁后,经过八年时间的治学和教学认为“温故(学习、借鉴古代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而知新(而去对照、研究眼前社会、政治上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可以为师矣(就可以做统治者的参谋、顾问、导师了)。”然而孔子此时仍不见用于鲁国当局。

(三)行礼制,孔子在鲁施政

鲁定公九年,公山弗扰叛变事件被平息了。次年夏,定公就延请孔子做了鲁国中都的地方官,即“中都宰”。孔子把教育与政治统合在一起,“以贤弟子”们“为辅佐”,实施了“养生、送死之节”的礼制,和“长幼异食”(让老年、幼年比青壮年人吃得好一些),“强弱异任”(量力对身体强弱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任务),“男女别途”(让男女群众不要交叉乱在一起行走)。这以后,地方上的生产、生活有了秩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有了保障,不求非分财物了,也知道勤俭过日子了,因而中都地方出现了“路不拾遗,器(具)不雕伪(不过分讲究华丽装饰)的淳朴风尚”。同时,他还规定了丧葬“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为坟,不封(聚土培坟)、不树(坟茔不植树)”的制度,限制了贵族和富裕“自由民”办理丧葬,恣意耗费木材、占用耕地,以维护农林业的生产和发展。“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即效法中都的做法。定公很高兴地对孔子说:“学子此法,鲁国何如”?即适用于鲁国吗?孔子说:“虽(行之于)天下,可乎(都可以的)!”“何但(只在)鲁国而已哉!”于是定公便擢任孔子为鲁国主管水土等事的六卿之一的“司空”官。这以后,孔子经过组织勘察,“乃别五土(五种不同的地势、地质与土壤)之性”,划分山、川、丘陵、平原、洼地,分类安排,指导农、林、牧、渔各业生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也就是地尽其利,各物的生产都得到了发展。之后,孔子又被“擢(任)为司寇”,主管了司法行政。

孔子任司寇后,除致力于整顿鲁国的法制而外,还参与了外交、军事活动。鲁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地方),孔子相”。孔子随从定公做辅臣,就表现出外交、政治和军事上的机智与才干。“夹谷之会,齐大夫犁弥,以(为)孔子知礼而无勇,与齐侯谋,使莱人以兵(武器)劫鲁侯”。孔子以事前

有武备，当即指挥鲁军自卫，并喝令：“士兵之”！命令随从武士还击莱人，接着高声对齐侯说：“两君合好”，开会，“而裔（指莱人）之俘（是齐国的俘虏）以兵（武器）乱之（来捣乱会场）”，“非齐君（你）所以命（倡导于）诸侯（的正确态度）也”。

鲁定公得到这位平民出身的大臣——孔子，看到孔子的政治、外交、军事的才干和魄力这样大，疑虑自己的大权会被孔子篡夺，心颇不安。于是有一天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何（各应持什么态度）？”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的这个答案，虽然提出了君权只能在礼制的范围行使，即按礼制的规定行使，限制了当时君权绝对化的个人专制、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但又表明，在君按礼制使用臣宰时，臣宰即应持忠于君的态度。所以鲁定公听了才安下心来，继续信任、重用孔子。

孔子“以司寇摄行相事”，是鲁定公十四年的事。他“摄行相事”时“有喜色”。门人（对他）曰：“闻（老师说过），‘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言外之意，是说老师现在为何喜形于色呢？孔子曰：“有是言也”（我有过这话），但你“不曰（我是）‘乐其以贵（而能谦恭地）下人（低下架子待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据说：“少正卯，鲁之闻人也（知名人士）”，“在鲁（国）与孔子并（同孔子一样的聚徒讲学）”，但与孔子思想对立，曾使“孔子之门（下的弟子）三盈三虚（三次反复吸引了孔门弟子）”。

“夹谷之会”的召开，就是齐人忌怕孔子任司寇，振兴鲁国，不利于齐国而提出的。在那以前，齐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鲁用孔丘，其势危齐。”在犁弥的建议下才召开了“夹谷之会”，企图侮辱鲁公以打击孔子，离间鲁公与孔子关系。后来齐人在“夹谷之会”上阴谋未逞，反而被迫归还了侵占鲁国的田、邑。但齐人并不甘心，所以虽然表面上同鲁国言归于好，实则仍在伺机对付孔子。当探听到鲁用孔子主张，鲁国内部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齐侯害怕，即改变了策略，企图腐化鲁国的国君，给孔子为政制造障碍。这就是所谓“齐人归女乐”，给季桓子送来一队姿容秀美，吹弹歌舞优良的舞女。齐人这一着击中了要害，使“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对于“齐人归女乐”的阴谋，不知是没来得及及时揭露，还是疏忽大意了，及至季桓子接受齐女乐“三日不朝”时，孔子才感到劝阻为时已晚，奈何不得了，于是离开了官舍，以失败者的情绪回了家。但他并不甘心，于是弹琴悲歌了一曲：“予欲望鲁兮（我想过问鲁国的政事啊）”，“龟山蔽之（当政的季桓子不朝，阻止了我）！”“手无斧柯（我手里不掌兵权）”，“奈龟山何（对季桓子也奈何不得）！”这则歌曲，即所谓孔子的《龟山操》。由此看来，孔子如操兵权很可能会起而废黜季桓子或强迫季桓子退还齐国这队女乐。这年孔子已54岁，去官之后，心绪不免摇落。因而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当时流传的象征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时黄河便出现图画的一种神话），吾已矣夫（自己在鲁国的政治生涯不可能继续下去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别国了。这时就打定了周游列国的主意。

（四）传儒术，师徒周游列国

孔子去职后，率领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大联合的政治宣传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学术团体游说于国际间，为民请命的联合大请愿。当他们离开国都走到“屯”这个地方住宿时，乐师“送（行）曰：‘夫子非罪也？’（夫子你没有罪过呀）”，言外之意是为何你要离职出国呢？孔子不便细讲原由，说：“吾歌可乎（我唱支歌，你就知道了）”。相继唱道：“彼妇之口（那些齐国送来的‘女乐’的歌唱）”，“可以出走（就可以使我离开鲁国出走他国了）”；“彼妇之谒（季桓子被齐国送来的‘女乐’所亲近而迷惑了）”，“可以死败（鲁国的政治会因此而无希望，败坏）”！“优哉游哉（我可以轻闲地游历了）”！“聊以卒岁（我就到别国去消磨时光吧）”。乐师返回国都后，季桓子问他：“孔子亦何言（孔子走时路上说了些什么）”？乐师学说了孔子的唱词，季桓子感慨叹息地说：“夫子罪我（抱怨我）以群婢（是因我接受了齐国的女乐）故也”。看来季桓子是知道孔子出走的原因的。此时，孔子也还在等待季桓子有悔改表现，所以在走到鲁国边境时，对随从弟子们说：“迟迟吾行也（我们慢慢地走）”，这是“去父母国之道也（离开祖国应持的态度啊）”。这主要是他还想再等着看看动静，如桓子悔悟，就有一线希望，那就仍回头继续干下去。孔子就是这样不甘心半途而废于鲁国实现其理想的“仁”道政治的。

孔子与弟子们出国后先到的是卫国。由于几年来孔子在鲁国参政政绩卓著，声名震扬于各国，所

以当他与弟子们到达卫国边境的“仪”地时，就受到那里的边防官——“封人”的欢迎，请求谒见。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以“民”为本。因此，他一开始便注意到卫国有众多的人口，赞赏说：“庶矣哉（好啊，人口这么多！）”替他赶车的弟子冉有接着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人口既多了，又该怎么治理呢？）”孔子说：“富之，（想办法让人民富足起来嘛）。”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人民富足起来后，又该做什么工作呢？）”孔子说：“教之（办教育，让人民学文化，掌握知识，摆脱愚昧，在文明道路上前进嘛）。”孔子所说的“教之”，就当时面对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来理解，无疑是普及全民教育，也就是他“有教无类”的不分贫富贵贱一律收教的办学方针的具体化。孔子的这种教育观，是冲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劳动人民概无受教育资格的传统。孔子所说的“教”的主要内容，无疑便是“德”和“礼”，即他所谓“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其目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有耻且格”，即知道不懂礼是耻辱，而且懂得依礼而立身处世。

孔子的勤学好问，在卫国期间也毫不懈怠。一天，他向公明贾询问卫大夫公叔文子的为人时，说：“信乎（真的）夫子（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于人）乎？”公明贾说：“以告者过也（这是告诉你这话的人把情况说得过分了）；”“夫子时然后言（该说的时候才说）；”“人不厌其言（人们就不厌烦他的话）；”“乐然后笑（快乐了才笑）；”“人不厌其笑（人们所以不厌烦他的笑）；”“义然后取（有道理时才接受别人的财物）；”“人不厌其取（人们所以不厌烦他取接人的财物）。”孔子听了，觉得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很好，在当时官员中是极其罕见的，心里还有些不大相信，于是进一步追问公明贾：“其然乎？岂其然乎？”意即是这样的吗？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孔子后来接见了卫灵公。孔子所以选择了卫国为游说的第一站，本来是鉴于卫灵公的好战扩张政策给卫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太大了，而企图说服卫灵公罢兵、息战，改行自己理想的“仁”道政治，以拯救卫国人民，然而卫灵公之所以接见孔子，还是想借孔子声名和才干实现自己开疆拓土、扩张势力的企图的，他醉心于战争，思想上是军事第一，所以一见孔子，略事寒暄，便“问阵于孔子（向孔子请教战略和战术）。”两人的思想、企图恰恰相反。于是孔子对他说：“俎豆之事（祭祀的礼仪），则（我）尝闻之矣（我是熟悉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此话，很显然是想把与卫灵公的话题转引到谈论改革卫国的战争政策上的，但话不投机，谈不下去。失望之下，孔子第二天便离开卫都。孔子动身离开卫都时，同弟子们说出了对卫国政治的观感：“鲁卫之政，兄弟也”。意即两国的政治，和兄弟一样差不多的，都很不好说服当局进行改革。他让为：“贤者辟世”（古来的贤人处在乱世是要隐居，不作官参政的）；“其次辟地”（有的贤人是要避开政治黑暗的国家，到政治清明的国家去作官、参政）。

孔子和弟子们到了宋国的“匡”地。由于孔子的相貌、身躯和阳货差不多，匡地的人是仇视阳货的，孔子于是被匡人拘禁了，即所谓“孔子拘匡”（《荀子·赋》）。孔子不明原因，不免感到突然和恐惧，即所谓“子畏于匡”，但仓卒间也没法子挣脱，因而感慨地对弟子们说：“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文王既已逝去了，当今拨乱反正，安定社会秩序，使人类安居乐业、文明幸福生活的这个历史使命，不就落在我们师徒们的肩上了吗？由此可知孔子的思想情趣和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思想基础。“未几（没多时）匡人解（围）去（走开了）”。“匡人”的“解围去”，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孔子在围困中曾密“使弟子（突围）为宁武子的家臣于卫（国）”，可能得到宁武子的救援，匡人才被迫解围走开的。所以孔子“然后得（以走出）去”，“过蒲（地）月余（后）反乎卫”。这次返回卫国，就“主（住）蘧伯玉家”了。

当孔子不愿在卫国参政时，晋国范氏的家臣、孔子过去的弟子“佛肸，以中牟（占据中牟地方）叛（向晋国执政的赵鞅造反了），请老师去帮忙。孔子也有意去借机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但子路认为老师去帮佛肸的忙，是协助乱臣，便又质问孔子，说：“昔者，由也（我）闻诸（听到过）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亲自拼自己身子做坏事的那里），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叛乱），子之往也（老师却想去帮忙），如之何？（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有是言也”（我讲过这番话）。可是“不曰坚乎？”（人们不是也说过有种最坚硬的石头吗？）“磨而不磷”（它是磨不动的）；“不曰白乎”（还有种最洁白的石头），“涅而不缁”，（它是染不黑的。）“吾岂（是）瓠瓜也哉？”（我难道象葫芦一样吗？）“焉能系而不食？”（怎么只

能挂在蔓儿上不能吃呢))《论语·阳货》)孔子热衷于行“仁”道，革新政治的急切心情此时又一次表露出来。后来赵鞅伐卫时包围了中牟，孔子没能成行。就率领弟子们往返于陈、蔡二国之间。但由于他曾有意去中牟帮助佛肸，引起了赵鞅的怨恨，后来据说赵鞅欲专政，对他的亲信说：“赵(地)有犢犢，晋有铎鸣，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之后就召请犢犢、铎鸣二人，伪称向他们“问政”，借机杀害了他们。相继又“使使(者)聘(请)孔子于鲁”，并密告使者：在孔子应聘来晋渡河时，将孔子推下河去。“孔子适(去)赵(鞅处的途中)，临河不济”，很可能是看出破绽而不上船了，遂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回去、回去吧，何必在这里让人陷害自己呢？)(《新序》王谟《编后语》)孔子因此未渡河去见赵鞅。

孔子率领弟子们往来于陈蔡之间，居止无定。由于陈蔡当局不尊贤礼士，后来又遭灾荒，以致孔子与弟子们的生活竟困顿到断炊、吃不上饭的严重程度。即所谓“穷乎陈蔡之间，七日不(能)尝(到一粒(米))”。

孔子受到楚王的解救并厚礼邀请，转危为安于陈蔡后，心情是很振奋的，遂即愉快地应邀到楚国会见了楚王。

楚王设筵席欢宴孔子，让孙叔傲与市南宜僚二人作陪。“孙叔傲执(酒)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先)祭(神)后，”举杯祝酒时说：“古人之乎，于此言已”，古时政治外交家，是在宴会桌上交谈的。他示意孔子：谈谈高见吧！孔子即席说：“丘也，闻‘不言之言’矣”(孔丘我嘛，听古人说过‘不言之言’了)“弄丸”而“两家之难解”；“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郢人不动兵就无敌国敢于侵袭楚国了)。“丘，愿有矰三尺”(我听后感慕得垂涎三尺啊)(《诸子集成·庄子集解》)。楚都有位渔民，听说孔子来了，敬慕孔子为人，便赠鱼于孔子。“孔子不受”。渔人说：“天暑，市远，卖之不售”(近处卖不了多少)，“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所以请老先生不要客气，收下吧！孔子于是“再拜(为礼于渔夫)受(下了)”。使弟子“扫除(庭院)将(以鱼)祭之(于神)”。弟子说，“人将弃之(的鱼)，今吾子(老师)将(以此鱼)祭之(神)何也”？孔子说：“吾闻之(古人说过)：‘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宁愿施舍于人而不肯让多余的东西腐烂的这种人，是圣人一样啊！)“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后来楚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但是楚令尹子西不同意，他质问楚王：“王之使使(于)诸侯(的人)，有如子贡(那样才干的)者乎”；王说：“无有”。又问：“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王说：“无有”。又问：“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王说：“无有”。又问：“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王说：“无有”。令尹子西接着说：“楚之祖(受)封于周，爵秩(即级别)号为子男，(封地)方五十里。今孔丘述先王之法，(要昌)明周(公)召(公)之业(迹)。王若用之(任用了他)，则楚安得世世堂堂(保有)方千里(的疆域)乎”？令尹子西还进一步打比方说：“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都是)百里(地方)之君，卒王天下，今(让)孔丘得据(七百里的)土壤，贤弟子为(辅)佐，非楚之福也！”楚王听罢，觉得有道理，有些惶恐，即未实践诺言封地于孔子。

孔子失望于楚国之后，即率领弟子们又到了卫国。这时孔子已63岁。到卫以前，卫灵公已死。其子辄当国。辄的父亲蒯瞶在灵公生前，因怨恨灵公夫人南子与人私通，谋诛南子未遂，逃奔宋国，后又转往晋国了。及灵公死后，南子立辄为君，即为出公。蒯瞶以父在君位应由父继，为此与辄父子争国。当时各国诸侯倾向蒯瞶，舆论责难卫君辄，辄受到诸国压力。子路认为，辄很可能谋求孔子支持自己。因而问老师：“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老师将先抓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纠正名分上不合礼的问题。子路不以为然，冒失地责备老师说：“有是哉？子之迂也”！(有这个必要吗？老师你真老糊涂了！)“奚其正”？(何必先正名分？)一句话说得孔子大为恼火，立即斥责说：“野哉，由也”！(好个粗野的由啊！)“君子于其所不知(的道理)，盖阙如也”(是不胡说的)。我所以说一定要先正名的道理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人民就不知该怎么行动才对)。“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所以君子行道是先正名分，名分一正，一定能说出道理)；“言之必可行也”(能说出道理，政令必能行得通)；“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意即作君主的人，对于政令不马虎地随便发出，就政通人和了。冉

有此时也不知老师究竟有无辅佐卫君辄的意向，便问子贡：“夫子为卫君乎？”子贡也不清楚，说：“吾将问之”。他进见了孔子后，巧妙地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意思是他兄弟二人都互相让位，结果都不肯做国君跑到外国去了，以后懊悔怨恨过自己做错了没有呢？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们追求的是仁让，都达到了仁让的目的，有什么怨恨的呢？）子贡由此理解了老师主张礼让，不会支持卫君辄同父亲抗争君位。出来就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

本来孔子失意于楚后，是没有再到卫国的打算的。只是那时颜回想要来卫，与老师讲了他要来卫的原因后，孔子才率领弟子们前来的。在来卫之前，孔子问颜回，你想去卫国干么呢？颜回说：“回闻卫君（辄）其年壮；其行（事）独（断、专行）；轻用其国”（轻率地使用国力），“而不见其过（错）；轻用民死”（轻率地劳役人民，刑杀人民）；“死者以国量”（冤死的人民全国到处皆是），“泽若蕉”（沼泽里抛着好多人民的死尸），“其民无如矣”（那里的人民无法活下去了）。“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治理得好的国家那里，无事可做，可以离开），“乱国就之”（秩序混乱的国家那里，有事可做，应去设法治理）。“医门多疾”（老师还打比方讲过医生的门前病人多啊）！我“愿以所闻（于老师的这些教导）思其则”（为原则去卫国参政），“庶几其国（的混乱秩序，人民的苦难）有瘳乎”（能够大致好过来吧）？孔子听了认为其处心积虑是可取的。但考虑卫国的政治病根深了，积重难返。于是他叹息了一声说，你去后弄不好会遭杀身之祸。他持的理由是：“夫道”（为政之道），“不欲杂”（不可想得太多，抓得太碎）；“杂则多”（事就繁多了），“多则扰”（就自扰也扰民了）；“扰则忧”（扰民则生祸乱），“忧而不救”（祸乱一发生就不易救治了）。“古之至人（至德之人），先存诸己”（先致力学习，长自己的才干，使自己有治理乱世的把握），“而后存诸人”（然后才去指导人家，让人家接受自己的意见行事）。如果“所存于己者未定（未能有把握），何暇至于暴（露）人之所行（政令的错误呢）？且若（你）亦知夫德之所荡（失），而知智之所为出（超出智力）乎哉？德荡乎（好）名，智出乎（于）争（取人家为善）。（争）名也者，相轧（倾轧）也；智也者，争之器（工具、手段）也。二者（与人争名而斗智）凶器？（是危险的不好的），非所以尽（自己的有限才力）行（事而能达到自己目的的）也”（《庄子·人间世》）。

孔子不愿让颜回去卫国，为什么自己又率领弟子们去到卫国呢？一是听颜回所说卫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而动于心；二是想着他同弟子们一起去，人多智广、力强，也许能扭转卫国的大局。然而来到卫国之后，亲自看到卫君轻国、轻民、刚愎自用，不恤人言。而他又懂得“事君数，斯辱矣”（《论语·里仁》），即对象卫君这样坏的国君，说得少了不济事，说得多了会招致怨恨自己、侮辱自己的结果。于是他也就无意干预，采取“不可则止，无自（取）辱焉”的态度（《论语·颜渊》）。但由于孔子名重于时，到处有人敬仰。卫大夫“孔文子”这位“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官员，这时乘孔子在卫，便有意任用孔子。他的打算是，请孔子作参谋，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即所谓“孔文子将攻太叔也，访（求）于仲尼”。孔子却是不主张穷兵黩武的，他一向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婉辞拒绝了，他说：“胡簋（祭礼）之事，则（我）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说罢，送别了孔文子，回头即让弟子们驾车走！并对弟子们说：“鸟能择木（树而栖），木岂能择鸟”？孔文子移时懊悔自己失于考虑，急忙前去挽留。可是此时“鲁人以币（礼物来）召之”，孔子遂决然率领弟子们返回鲁国了。

孔子率领弟子们于鲁定公十三年离鲁，到这年返回鲁国，计先后周游列国十三年。他们踪迹无定，风尘仆仆地拜见并苦口婆心地游说了七十二（位国）君（和当政大夫）。虽然大得名声，但也经受了困厄、冷嘲热讽与屈辱，还到处碰壁，能未得展，可以说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企图是以失败告终了。因此，他慨叹：“已矣乎！”这些年在列国的宣传活动结束了！“吾未见（到各国当政从政的君臣们之中有一个）能见其（政令的）过（错）而内（心里）自讼（自我责备而改恶从善）者也”。

周游列国十三年“道不行”最后应召回国的孔子，虽然不自颓丧，但别人却有些不好的看法。他过去的老朋友微生亩，就曾当着他的面说：“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欤）”（你为了啥而这样庸庸碌碌跑来跑去呢）？“无乃为佞乎”（不就是逞你能说会道吗）？言外之意，是认为孔子是自讨苦吃，全没必要奔走的。孔子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意思是，我只是厌恶现在那些当政的人们不识时务，顽固不化

地一味残民任战，我才不惜奔走四方，为民请命，要他们改行“仁”政呢。

这时，孔子的学问道德，随十多年的国外阅历，较前大有增益，加以季氏的“币召”，在鲁国朝野声望更高。这样，孔子也就有了治学、教学，进一步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时间和精力。

(五)当顾问，孔子参赞政务

这时，鲁哀公虽然当国，但实权已由“公室”下移到“私门”季康子手了。哀公的政令臣民多不服膺。他不时向孔子咨询有关政治以及一些自己迷惑难解的社会问题。

在政治方面，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怎样做才能使臣民服膺政令）？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即举用正直的人做宰臣，废掉不正直的宰臣，臣民就服膺政令；若举用不正直的宰臣，臣民就不服膺政令。孔子还认为，如举用正直的宰臣，那些不正直的臣民们，也就不敢为非作歹，因而也就安分守正了，即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一天，哀公对孔子说：“寡人（我）生乎深宫之中，长（成）乎妇人（妃嫔侍奉）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其用意是问孔子：悲哀，忧愁，劳苦，畏惧，危险等说法，对国君来讲，有什么意义和怎样才会有？孔子对他说：“君入（太）庙门，仰……俯（抬头、低头）见……榑（音虽，屋檐）、栋（柱子）……几、筵（供桌、铺陈），其器存（那些祭品都在），其人亡（那被祭的前人都是亡故了的君主），君以此思哀（人生时间有限，都免不了要死亡），则哀（心）将安（怎能）不至矣？君……平旦（清晨）而听（政于）朝（庭），一物不应”，（所听到有任何一件不满意朝政事物的反映），“乱之端也”（那就是祸乱发生的开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心）将安不至矣？日昃（下午）而退朝（庭），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门庭者。”即等待着君，向君看望，请教或来办外交事务的一些公私宾客，须接待、周旋和酬酢，特别是要与人家谈论政治问题。“君以此思劳，则劳（苦的滋味）将安不至矣？君出鲁（都）之四门，以望鲁之四郊，亡国之（废）墟，列必有数矣”（一系列列的必能够指数得清楚了），“君以此思惧（想他们亡国的原因的可怕），则惧将安不至矣？”孔子接着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心）将安不至矣？”他又打比方说：“夫（君）执国（家）之（权）柄，履（站在）民之上，慄乎（危险可怕啊）如以腐（败了的绳）索驭奔马。《易》曰‘履虎尾’，脚踩在虎尾上；《诗》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听了一再拜谢孔子，说：“寡人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意即我虽不聪明，我是要照你这些话考虑问题的。又一天，“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问孔子：“人道谁为大”（在人事上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孔子皱了皱眉头说：“……人道政（事）为大”。哀公又问：“为政”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为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君（行）为正，则百姓从政（服从你的政令）矣”。孔子还说：“古之为政，爱人（民）为大”。

在社会问题方面，哀公也有很多疑惑不解的。一天，他问孔子，人们说“东益宅（东房高的院子）不祥，信有之乎”（真有这个因果吗）？孔子说：世间“不祥（的事物）有五，而东益（宅）不与焉（不在内）。夫损人而利己，身之不祥也；弃老（人），取幼（只养自己的幼年子女），家之不祥也；释（抛牵）贤（人），任（用）不肖（不懂道理的人为政），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育青少年），幼者不学，俗（社会风俗）之不祥也；圣人伏愿（隐居在民间），天下之不祥也”。一次，哀公问孔子：为什么说君子应重视天道？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他认为所贵的就是重视天道不停息地前进，自己的思想认识也应不停息地提高。“不闭其久”，即不闭塞、保守，而是常常通畅的，“是天道也”（这也是天道的自然）；“无为而物成”（不加摧残，任万物生长），“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万物既生，就让万物茁壮地成长），“是天道也”。孔子接着联系人事说：“仁人不过乎物”，即有仁德的人，能正确对待事物，不犯过错。不尽之意是说，天道就是这样对待万物的。

(六)立儒说，孔子潜心著书

孔子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原则，按他自己说，是“述而不作”（阐述而不创作）；所持的态度是，“信而好古”（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而以自己喜爱古代文化的热忱来作的）（《论语·述而》）。他还曾表白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不调查、不掌握资料、没有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就作的人），“我无是也”（我不

是这样)，我首先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找有关的人们询问，听人们述说。选择那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或有根据的说法，而用它）；“多见而识之”（多方面实地观看，并记下来，这是在听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概括来说，所采用的就是听、察结合的方法（同上）。

孔子早在青壮年时期，包括周游列国期间，即注意考察、蒐集古代历史文化的传说、实物和有关文献。所以掌握的情况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方法等等，应有尽有。具体说，从尧舜之世，到西周和春秋中前期的传说，统治阶级的官书、庙堂文献、一切礼仪设施，民间和统治阶级的诗、歌、音乐，贵族占卜的工具、工具书简等等。他掌握了这些大量的资料后，用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功力，注入了很多心血，通过鉴别、分类、分析、综合，终于整理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他所说的《六艺》，集中华民族的古代历史文化的大成，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继往开来的丰碑。

孔子整理上述《六艺》，实际上也有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的。当然总根子是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具体地简要地说：《礼》，是根据夏、殷、周三代的礼制，以周公关于礼的遗作为基础而加以删削和整理的。当然所删的是不可信和不合于自己观点的东西，也即是不合于他自己的伦理——人生哲学的东西。他整理《书》，是“追迹三代之礼，以备王道”借鉴（《史记·孔子世家》），当然是以他自己的“王道”和“仁政”的政治观点来着笔的。《诗》，主要是西周时期民间歌谣和奴隶主统治阶级生活中的一部分歌舞曲。他蒐集到的很多，即所谓“古者（古时）《诗》三千”余篇，他“去其重（复的），取可施于礼义”的部分（同上），保留了三百来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无邪”是说其思想内容没有不“纯正”的东西，亦即保留了“纯正”的东西，所谓“邪”的标准，都是联系到社会效果，政治作用的，即他所说的“迩之（近点说）事父，远之（远点说）事君（居官为政），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都表明了所本的是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易》，据说原是“羲、文之旨”，即伏羲、文王的思想，而被殷、周贵族用作占卜吉凶的东西了。孔子通过整理，又创作了《彖》、《象》……等辞，排除了关于鬼神的神秘观点，强调了人事的客观规律性，即所谓“天心”的自然规律性。孔子所本的，即是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孔子对于《乐》的整理，是保留了他认为好的，可以陶冶人的真、善、美感情的，和可以宣泄人们心情“湮郁”的东西，删除了他认为不好的东西。即他所谓：“乐正”（即正乐）使“《雅》、《颂》（等诗篇）各得其所”即是使这些诗篇合于他所认为真、善、美的东西。至于《春秋》，他是就鲁国的史书所载的国内国际的大事记、君臣言行，以“笔削，褒贬，为后王（后世统治主）立法”的思想修订的，“不仅为纪事之书”，很明显，也贯穿着他的政治、社会观点。他后来对颜回说：“襄（过去），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教于）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他说的“修”、“正”，其涵义便是所谓“约其文辞而旨博”。意即简化了原来的文词，把原来奴隶主统治者记事的意旨，由狭隘地为了使自己子子孙孙统治人民，而扩大为裕民强国的蓝本。因此，他的《六艺》，也有为他教学使用的意图，实际也用于他的教学了。孔子整理《六艺》的观点，并不是主观凭空想象而来的，是有其实践基础的。早在周游列国期间，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后来，他对弟子们说：“入其国，其教（化）可知也。其（指统治者贵族）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的作用）也；疏通（通达事理）、知远（知道古代历史政治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书》教也；广博（心量宽广，气量宏博）、良易（善良、平易），《乐》教也；洁静（言行合于人情，冷静）、精微（看问题细致），《易》教也；恭、俭、庄、敬（对人处事），《礼》教也；属辞比事（联系辞义对照实际，即理论联系实际，把事情办好），《春秋》（指各诸侯国的史书）之教也”。这是好的一面。孔子同时也观察到不好的一面，即古代这些文献流传中所发生的弊病。他对弟子们说：“《诗》之失（流弊），愚；《书》之失，诬（夸张、虚妄）；《乐》之失，奢（奢糜）；《易》之失，贼（相信鬼神，以占卜人事吉凶行事，言行脱离或违反客观规律，形成损人利己的结果）；《礼》之失，烦（繁多而烦人）；《春秋》（仍指各诸侯国的史书）之失，乱（处理国事时教条，保守，不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会引起人民反抗和贵族阶级内部矛盾）”。

（七）传儒道，孔子继续办学

与弟子们讲学论道、培养政治人才。孔子回鲁后，因仍未被正式任官，曾反躬自问：“莫我知也夫”！没有人（指统治主）了解我了！子贡说：“何为其莫知子也”？（怎么就没人了解老师了呢？）意思是说，我们就了解老师呀！只是那些当政从政的人们不了解老师嘛！孔子却不以为然，说：“不怨天，不尤人”（不怨恨天，不指责人家），“下学而上达”（低下头学习，掌握高深的知识和道理），“知我者其天乎”！（了解我的就是那老天爷了）。（《论语·宪问》）实则他回鲁时已打定主意，说“归乎，君子隐而显”（隐居学道，争取将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矜而庄”（不自尊大而严肃认真地治学）（《礼记·表记》）。回到鲁国以后，他应邀派出不少高材生在国内外参政、从政。例如：颜渊、冉有、闵子骞，子游，曾参，宓不齐，原思，高柴，樊须，公西赤，巫马子期，孟孙何忌，孔蔑，子贱……等等，皆先后从政于鲁国的都邑；参政从政于国外的还有：子路在卫，曾参在齐、楚、晋，子贡在齐、晋、越、佛肸在晋……。都在一定范围，基本实践了老师的政治主张。

有教无类——孔子的办学路线。孔子办学，由于与殷、周统治阶级的办学的方针相对立，所收的弟子，知名的，除了孟懿子、南宫敬叔来自贵族家庭，其余绝大部分来自贫贱人家及少数所谓“自由民”。高材生中，如颜渊是一个，“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穷苦子弟（《论语·雍也》）；如曾参，母亲以纺织为业，自己曾种地“耘瓜”；子路，曾穷得“食藜藿（草籽）”为生；子张原是“鲁之鄙（贱）人”；仲弓，孔子比喻为“犁牛之子”（犁牛，贱牲畜，喻仲弓之父贱而行恶）；闵子骞，父亲出外时还得给父亲拉车子；原宪，家住穷巷，穿戴破旧；公冶长，还是被人疑为盗窃，拘囚“在縲继”（监牢）受过冤刑的青年；至于比较富裕的子贡，也不过是个“自由民”的商人。

孔子收教这些贫贱人家的子弟，让他们“学而优则仕”，出去做官，实行他的“仁”道政治主张。这在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贵族阶级的嫉视。

《六艺》——孔子的教本。孔子办学，是以《六艺》为教本的，是以“文、行、忠、信”分科的。“文”是文化；“行”是道德情操；“忠”是尽己为人；“信”是言行一致，言而有信。这四种内容，都是劳动人民所喜爱的。因而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劳动人民家的青少年。在先后四十余年中，就收教了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把殷周以来专为贵族服务的“儒术”，改造成经世济民的“儒学”，孔子自己也就成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开山祖”了。

晚年的孔子，遭遇是不幸的：69岁时失去了仅有的一个儿子鲤；71岁时失去了出类拔萃的弟子颜渊；72岁时，又失去了高材生子路。孔子回顾了几十年的治学经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自然规律），六十而耳顺（听话都能分析其思想），七十而从心所欲（为），不逾矩（不出轨）。他虽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在逝世前的重病中仍不甘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未能实现，并哀歌自况，歌曰：“泰山颓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歌罢涕泪俱下，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统治者没人能行我的仁道）后七日，就逝世了。终年72岁。

为人师表——孔子处处严以律己，谦虚好学，至老不倦。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学习的一生。他自述“敏以求之”，“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晚年还希望“加我数年，吾卒（彻底）学《易》”哩。他所以博学，就是一辈子不忘学习，即所谓我“少而好学，晚而闻道，以此博矣”。他所以能够一生“学而不厌”，主要就是永远谦虚，永不自满。别人称他为“圣人”，他自谦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当）”。

言行一致，致力行道。孔子说：“君子多闻，质而守之（以行）；多志（记），质而亲之（实践）；精知（精深地认识事理），略而行之（大处用于实践）”；还说：言必虑其所终（说话时要考虑到影响与后果）；行必稽其所蔽（行为要考虑有什么坏效果和影响）。直到晚年卧病，子路使（其）门人为臣（仆），他还斥责子路，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我）无臣而（给我）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

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谦恭之意）”。出外时，衣服整洁，举止端正，即所谓“出门如见大宾”那样。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诚）”；“敬而勿（无）失（礼），恭而有礼”。平日在家时个人与环境卫生都搞得很好，即所谓“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对于孤苦无依的穷朋友非常慷慨、怜恤，如“朋友死，无所归（无人收）”时，孔子就说：